



上海财经大学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产经智库 专题报告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nk Tank Special Report

“自贸区建设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论坛
特刊

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
CHIN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总第12期
2014-10

目录

一、“自贸区建设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论坛——主题报告会

| | |
|---------------------------------------|----|
|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教授主持发言..... | 2 |
|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致辞..... | 3 |
| 王新奎：开放倒逼改革仍待破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任重道远..... | 5 |
|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的产业政策..... | 11 |

二、“自贸区建设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论坛——圆桌讨论会

| | |
|--|----|
| 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上海高校智库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干春晖教授主持发言.. | 23 |
|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发言..... | 28 |
|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理事周振华教授发言..... | 37 |
| 南京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理事刘志彪教授发言..... | 39 |
|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教授发言..... | 42 |
|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副所长、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理事权衡教授发言..... | 45 |
|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教授发言..... | 48 |
| 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孙元欣教授发言..... | 50 |

三、“自贸区建设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论坛——媒体互动

| | |
|-------------|----|
| 媒体互动实录..... | 52 |
|-------------|----|

四、“自贸区建设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论坛——后续媒体报道观点

| | |
|---------------|----|
| 媒体报道（部分）..... | 56 |
|---------------|----|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教授主持发言

尊敬的林毅夫教授，尊敬的王新奎教授，尊敬的樊丽明校长，尊敬的蒋传海校长，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今天，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一周年特殊的日子，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教授。两位著名学者将围绕“自贸区建设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题展开高度对话和讨论。

首先，让我们热烈欢迎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为本次论坛致辞！



鞠建东院长主持发言



研讨会实况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首先，非常荣幸能邀请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王新奎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以及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论坛，共同就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这一主题展开研讨。在此，我谨代表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向远道而来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内忧外患，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从国内形势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象十分突出，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从国际形势分析，我国面临着许多国际或区域性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压力。因此，面临如此新形势、新任务下，必须要有新尝试，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我国扩大改革开放的一项新尝试。自贸区在中国是一种全新的事物，试点推进过程中势必遇到诸多疑难问题，因而亟需专家学者做好基础性和政策性研究，使试验区成为我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进一步通过对外开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上海财经大学是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管、法、文、理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重点大学，是国家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2012年成为教育部、财政部和上海市政府“两部一市”共建大学。为了对接上海自贸区建设、服务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满足教育部、财政部、上海市政府等政府部门决策咨询的需求，学校积极建立了与研究型大学相适应的科研组织。目前，学校拥有3个协同创新中心，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个上海高校智库。

特别地，为了对接自贸试验区建设，我校成立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中心成立至今参与了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与总体方案升级版、2013和2014版“负面清单”、第三方评估、自贸试验区条例等系列重大

任务，研究成果多次受到李克强总理、韩正书记、艾宝俊副市长等中央和地方领导批示，为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经过一年的试验，自贸试验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将会是重点政策的复制与推广，并进一步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学校将继续发挥在这方面的研究力量，为中国经济的升级提供强力的理论支撑，为中国未来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谋取提供前瞻性探索和谋划！

最后，再次感谢王新奎理事长和林毅夫教授的莅临，期待各位专家学者和领导在讨论与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在此，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致辞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

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教授做主题报告

开放倒逼改革仍待破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任重道远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一周年之际，召开“自贸区建设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论坛是非常必要的，在此时期我们要决定下一步怎么走、明年怎么走，因此总体盘点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版的关系，这个课题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的。2013年3月29日李克强总理到上海视察的时候提出：以开放倒逼改革。思考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升级这个问题，同时也会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下一步的研究和决策咨询服务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10年到2011年之间，热点研究方向已经开始向后危机时代全球规则的重构趋势转变。在此期间，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协议——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特别是从中美BIT（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以后，似乎中国的体系规则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而且从对外的双边和区域性的贸易谈判当中，特别是从双边贸易型的谈话当中不难发现一个趋势——将原有的体系规则推倒重来，重新按照新的规则来谈判，这一点也特别反映在中韩FTA（Free Trade Area，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过程当中。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至少三到四年的时间，最近更加着力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研究与跟踪评估的研究平台的建设，同时也开始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组建一个相关的研究团队，并有很多单位协同研究。根据多年的追踪研究成果，对全球规则变化的趋势的描述，我大致有以下几个判断：

一、判断全球规则谈判的平台正在转移

中国贸易谈判的基本战略主要以“多边谈判”为主，但是实际的发展情况并

不完全遵循这个谈判规则。以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谈判平台为例，谈判过程中存在着众多复杂的影响因素。2013 年 12 月 7 日，在巴厘岛闭幕的世贸组织（WTO）第九届贸易部长会议，在召开前被寄予了一些期望，期望在“贸易便利化”的问题上得到一些共识，有一部分谈判高管当时认为这个谈判不会成功，但决议却戏剧性地在最后一秒钟达成了共识。但是最近印度突然反悔，使得这个协议失去了应有的效益。由此可见，多边贸易平台可能会在将来很长一段的时期内处于一个不断调整的状态，同时 WTO 也意识组织将会被边缘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有三个原因：一是缺乏多国支持，二是现有体系已经不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三是缺乏创造新议题的相关人才。

这就对中国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判断谁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这种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重新充分地去考虑其中的各种因素。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是双重性的，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实际具体的贸易谈判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利益需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致，反而与某些发达国家一致，这就给这个问题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中国此次正式提出参加贸易自由的谈判，就受到了印度等国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样的自由贸易对我国是有利的，但对他们却没有，这样两国的国家利益就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又比如说在最近的十多年当中，俄罗斯、巴西等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在退化，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制造大国，而只是维持在一个初级产品和原料的生产国家，并且这些国家生产增量的部分主要是供应给中国，在此国家利益再次产生了不平衡。所以俄罗斯、巴西等国家提出要在金砖国家内部进行产业升级，要求中国更多投资、要求中国降低关税，但这些要求是很难被满足的。

最近为解决这样的国家利益不平衡，中国提出“两路”，路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其中，我国领导访问了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大多是被边缘化的，但是多边贸易谈完之后还要在双边的区域性里面处理好好多边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此，现在关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平台的研究已经不能再泛泛而谈，也不能用大理论来概述，而必须要从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角度去描述清楚这个问题。比如说，“丝绸之路”是当下很热点的一个问

题，但是很少有人指出“丝绸之路”价值链的基础是什么，试想如果没有价值链的基础，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条件下我们如何谈贸易和投资？又比如说，中日韩三国虽然矛盾很多，但是根据这三个国家的全球价值贸易分析和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表明，这三个国家是最规范、最密切的、同时是属于东亚制造板块里面的经济核心，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更多地创新、更深地挖掘。

二、判断全新规则的重心正在转移

这个判断需要把历史和现在对比地去讨论：历史的议题我们称之为“20世纪传统议题”，从80年代中期中国参与谈判开始，现在的议题我们称之为“21世纪新议题”。我主要从贸易规则、货物贸易、实体贸易、关税壁垒、边境措施、自由贸易、经济标准这七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规则谈判的重点从贸易规则转向投资规则。美国从2004年范本转到2010年范本，再到现在的2012年范本，充分体现了美国在投资规则上试图推行的一套方法方式。这套模式是中国在过去并不熟悉的，我国过去签署了一百多条双边保护协定，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全球保护类的，但这和现在所讲的投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规则谈判的重点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当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其实在一开始是很不适应的，自贸区划定在27.7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就对很多方面无形地设置了某种限制，因为在服务业的领域里是没有铁丝网的，为解决这种无形的限制我们在规则上加了一句话——区内注册企业可以在区外投资，但这条规则是需要后期相应的跟踪和监管的，这就为实际操作增加了难度。因此，这次自贸区试验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服务业如何监管、如何开放，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第三，规则谈判的重点从实体贸易转向数字贸易。过去我们谈的都是实体贸易，甚至在货物贸易当中也是谈实体贸易。但是，最近几年工业产生了很多数字产品，这就使数字贸易的问题成为一个全新的问题。开始的时候，大家把重点放在了扩大电子商务的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商务的大量发展，但是借鉴近期美韩中谈判的FTI范本，我们可以发现在投资的领域中重点集中在电子商务，主要包含数字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和互联网的自由接入。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很难让步，而中国也很难让步。

第四，规则谈判的重点从关税壁垒转向监管壁垒。必须指出，这个问题的意义特别大，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基本上还保留着发展中国家的特征，是很难和发达国家同等谈判。因为关税壁垒在发达国家都已经到零了，同时发达国家目前的壁垒都是监管壁垒，而监管壁垒是没有具体规则的。而且，针对监管壁垒实施的规定往往并不涉及最关键的领域，比如说 TBT（Technical Barrier to Trade，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SPS（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Measures)，实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定），而实际上更为关键的监管应该包含标准、审批程序、监管程序、等候时间等等因素。

第五，规则谈判的重点从边境措施转向境内措施。很多人都判断关税下降会成为边境措施的弱点，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有一点虚张声势的，因为我国的进口有很大一部分是增值税。但是当下更为重要的谈判内容是境内措施，每一个文件都涉及到政府部门本身的权限、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最近正在准备的中美谈判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境内措施规则的制定是非常难的。

第六，规则谈判的重点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过去在谈判的时候，发达国家举的是“自由贸易”的旗帜，但发展中国家对自由贸易是存在很多疑虑的。但是现在谈判的时候，中国开始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而发达国家又转为谈“公平贸易”。公平贸易中包括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具体化而不能抽象化。比如说，劳工标准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标准，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劳动法等法律的立法标准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很高层面上的，但还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特殊性去制定更加精准的标准。

第七，规则谈判的重点从经济标准转向价值标准。在当下的社会投入产出表中价值标准已经被嵌入进去，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这当中所说的“21 世纪新议题”的大部分内容和我们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利用这次开放来倒逼改革。

所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目前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自贸区的窗口、测试的平台来推出一系列的“开放倒逼改革”的措施。特别涉及到要营造一个国际化、法制化、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的时候，一个新的适应全球角色转变的开放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中国已经不单单是全球规则的适应者，同时还是一个参与者。如何提出

适合经济全球化、同时还可以被发达国家接受的规则，对我们来说就必须经过国内的试验来得到答案。

开放的前提是参与，参与的前提是适应，适应的前提是改革。反过来讲，一方面开放倒逼改革，一方面不改革根本没有办法开放。如果改革的愿望没有，改革的措施就没有，那么改革也就无法建立起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开放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开放观。中国过去的开放促出口、出口促增长，而现在的开放观则是开放促改革。李克强总理在自贸区成立一周年之际到上海视察时说：上海自贸区有大未来，上海有大未来。上海作为一个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压力测试平台，不管什么方法都要拿来试一试，试得好就可以复制给全国，试得不好就舍弃。

下面我重点讲讲我工作这一年内发生的三件事，结合我实际工作当中的体会，尤其是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第六轮以及最近迅速推进的中美 BIT 谈判过程当中获得的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和体会在我看来与经济升级版这个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一件事，转变政府职能，从事前审批为主转变为事后监管为主。这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涉及到观念、政府部门的设置，更具体讲就是涉及到全球价值链以及人才。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关于基因药物的例子。据种种迹象表明，有关基因药物的基本理论、技术、路径都已经成熟，最主要的还未解决的问题就是机制的问题。在最近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当中，美方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哪种药是新药。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技术化的问题，新药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临床试验、一部分是上市核准，而这其中临床试验的最大问题就是“桥接试验”，也就是同一种药用在不同人种身上时所做的测试试验，全球的标准是忽略人种之间的差异，而在中国“桥接试验”是必须执行的一个环节。这就会造成美国从核准到上市一种新药只需 9~24 个月，而中国则需 6~8 年，这也就造成了中国的药厂都不愿意去研发新药的一个困境。因此，不难看出，这种困境的出现，问题并不出在研发新药的专家学者身上，而是出在事中事后的监管环节上。

第二个例子，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一年投入到芯片开发研究的科研经费已经

超过了一年芯片的总产值，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大量的投入并没有带来同等的产出回报。美国政府在这类项目投入上千万美金，而我国已经投入了几亿却还得不到预想的结果，这种投入却没有产出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监管环节的疏漏。

第二件事，中央要求上海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各阶段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管理。这个要求同时引进了一个形成管理透明的问题，中央所强调的“不公布不执行，凡公布必执行”应该成为负面清单的管理核心内容，但现状却是凡执行的都不公布，凡公布的不执行。今年，根据李克强总理的具体要求，负面清单中的子部门有了具体的限制、具体的程序以及具体的规定，这种转变相比较原先的负面清单有着非常突出的突破和进步。

第三件事，推进金融和海关监管制度创新，提高贸易的投资便利化的程度。金融海关制度的创新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适应服务贸易，根据一项比较权威的研究表示，发达国家制造业当中所包含的服务比重高于设备本身。所以，在海关监管当中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再是卡口监管而是状态监管，不再是单一窗口管理而是海关通关管理，如果能做好这一部分的监管工作，那么金融便利化和贸易便利化就不再是空谈空想。

最后，我还想回答一个“如何评价自贸区”的问题。从新开放观的角度来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很多领域都迈出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第一步，尽管破题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但只要坚持这个正确的方向，坚持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方向去不断探索，那么我相信未来是大有希望的。



王新奎教授做主旨报告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做主题报告

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的产业政策

非常高兴有机会能来上海财经大学参加此次讨论会，并向在座的专家学者、和老师学生介绍我对“新结构经济学”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几点想法。

此次讨论会具有重大意义，正值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周年。自贸区建设主要是中国产业政策的实践出发，而我更想从理论的角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看，我国在改革开放的 35 年内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中国已经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 2013 年年底人均收入达到 6800 美元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体，成就非凡。但是，目前我国仍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此，“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要在 2010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人均收入要在 2010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2010 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水平是 4400 美元，翻一番则是 8800 美元。要达到这一目标，经济增长速度需要保持平均每年 7.3% 的速度。7.3% 的经济增长在国际范围来看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但相对于我国平均每年 9.8% 的经济增速来说只是中高的增速。如果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人民币将继续升值。因此到 2020 年，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我国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 1270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2700 美元的指标，我国将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当然，12700 美元和美国 40000 美元和欧洲 50000 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但这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里程碑。

然而，纵观世界历史，二战后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目前只有两个：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则有 13 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2008 年期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相差 10 个百分点的经济体只有 28 个，其中近一半为石油输出国或矿产资源大国。另外，在此期间有 18 个经济体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超过 10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二战之后 200 多个发展中国家中，仅有 180 个国家一直处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当中。我国无疑是幸运的，

35 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从低收入陷阱中成功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能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数量非常少，西欧周边有 8 个经济体，亚洲有 5 个经济体。我认为，自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很差的原因并不在于自身的不努力。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我认为作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应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知识。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去过很多国家，我发现每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都有自己的国家梦。这些国家在二战之后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可是成功的少之又少。

其中，我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从二战到现在，没有一个经济体是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获得成功的，少数几个成功经济体推行的政策在当时的主流理论看来都是不可行的。但这并不是说违背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就一定可以成功。二战之后只有日本是个例外。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 35 年经济增速平均 9.8% 的成绩。成功经济体背后都有共同的愿望，这是知识分子们的共同责任，也是机会。

一、反思发展经济学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必须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固然，国外的很多大师级经济学家已对发展理论研究做出了很多贡献，但这并未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对现有主流理论进行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出一个新的和更好的理论。我尝试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步思潮，也为政策改进提出参考。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重要结合点就是产业政策。我希望提出一些新框架、新想法，最后形成理论对我国的实践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而制定国家具体政策的时候，能否从新的理论框架中获得一些参考。

第一，为什么要反思发展经济学？已有的众多大师级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了主要贡献，那么为什么还要反思？因为我们需要了解现象背后的逻辑，理论帮助我们认识现象背后的因果。但是，认识世界不是一个逻辑游戏。在此，我特别想对大学工作者和大学生们说，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满足于逻辑上的真理性。其实，认识世界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改造世界。因此，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企业、个人，应该根据理论来做决策，做选择，然后达到理论的预期效果。一个

比较现代化，比较和谐的社会能够帮助国民自己摆脱贫困的结果。经济学家如果只满足于漂亮的逻辑和数学模型，那么应该去读数学专业而不是经济学。

为什么反思发展经济学？经济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比如为什么有一些国家是贫穷的，或者是为什么根据这个逻辑所制订的政策不能达到所预期的效果，甚至按照理论做政策的结果比原来还糟。在这种状况之下，应该对理论产生怀疑，进行反思，思考能不能改进。

从 2008 年以后，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议题。基本上没有人在事前认识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即便有几个自称预测到危机发生并知道危机是怎么发生的人也只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而已。危机过去已经 6 年，发达国家还没有走出危机带来的影响。因为没能预测到危机产生，或者虽然预测到危机产生，但没有准确分析出危机产生的机制是，所以大家就对现有的主流理论进行了反思。

发展经济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从主流经济学分出的一个新的子学科。二战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了原来殖民地国家的影响，取得了政治的独立，开始自己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基于这个需要，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最先出现的发展经济学是结构组织。在当时的发达国家，产业技术非常先进，产业技术规模大且密集度高。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农业社会，是资源依赖型的经济。把这两个经济比较就知道，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力非常高，所以社会水平高，而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决定了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收益很低。这是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但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大产业呢？当时的理论认为，因为市场配置资源导致大规模的产业发展不起来。所以当时提出的理论是要变成现代化的国家就必须发展大规模的产业。基于当时的理论，政策确定也非常的清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斯大林模式下推行这个政策，包括新独立的、新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推行的政策都是一样，都是靠政府直接动员、支援发展现代化的大厂，导致的结果就是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工业体系。之后确实有一段时间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没有达到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而且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到了 70 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二版的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资源配置错误，加之由于政府的干预创造了很多租金，在这种状况之下，缺乏发达国家那样比较完善

的市场经济和能够让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体制安排，包括产权，市场化，制度化等，所以第二版的发展经济学提出政府退出市场，建立完善的像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经济体系，同时全盘推行理论模型。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向市场经济转型，在经济学界有一个初期的共识就是推行“休克疗法”。80、90年代，众多国家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转型，最终结果却是社会主义崩溃，危机不断。拉丁美洲国家、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在推行“华盛顿改革”以后，比60年代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低，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比60年代、70年代高，也就是说整个经济绩效比60年代和70年代的绩效还差。因此，有一些经济学家就称之为“迷失的20年”。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少数几个成功转型的经济体。从60和70年代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当时经济发展得非常快，逐渐成为新型市场经济体。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都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产业开始发展。通过发展这些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而不是用政府主导的方式发展现代化产业，这种政策在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政策。但是之后的事实证明，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正是这些国家。到了80、90年代以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转型，可成功的经济体非常少，成功的例子中有中国大陆、越南，以及70年代比我国更早开始转型的毛里求斯。成功案例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推行渐进的、双轨的模式。我国在80和90年代推行的这种转型方式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是双轨制经济，但是现在成功的竟然少数几个就是采取“最糟糕”的转型方式的经济体。

这些成功转型经济体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要么是市场经济，要么就是转向市场经济。“亚洲四小龙”最开始就是市场经济，而且政府都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日本政府、我国政府也发挥着积极有为的作用。从政策框架、社会体制方面来看积极有为不是结构主义的，也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只强调市场忽略政府”。现有的理论似乎可以解决这个国家为什么失败，但是根据这个理论来制定政策结果更糟。这种情况下我们学习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社会，必要时反思我们的理论。

世界银行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发展机构。世界银

行在 70 年代以前主要的政策是按照结构主义的，但是效果很差。在这个过程中也行比较和反思，所以世界银行是新的发展理论思潮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要根据效果不断的反思。所以新自由主义提出以后，世界银行也不断的在反思。当中包括 1993 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推行的是出口导向，东亚经济也并不是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所说的政府完全不干预。2004 年出版了《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增长》，当时书中有一个结论是世界上没有万能的药。最近出版的一个《增长报告》是两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和 20 几位经济学家但同时又担任过政府主要官员，对政策制定非常熟的学者们的研究。他们当时的研究主要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 13 个经济体取得了连续 25 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的每年平均 7%或者是更高的增长。这 13 个经济体的共同特色是，第一，开放性经济，宏观达到稳定，有高投资率，有效的市场；第二，一个有决心的，有信用的，有能力的政府。这与当时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相背离，因为新自由主义是不讲政府的。但是他们在提出这个办法的时候，只说明了以上是让发展中国家成功的五个“药材”，没有说明国家借此成功的“药方”。每个药材分量的不同会使补药变成毒药。事实也是如此，比如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发现，开放越大的国家经济跌的越厉害。基于上述原因，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思潮。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一直倡导要回归亚当斯密，回归到他的研究方法。《国富论》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本质和原因的研究是共同的。经济学家们获得经济学大奖，也都是按照研究本质和原因提出新的观点。比如，科斯的理论不是从《国富论》理论推出的，凯恩斯的理论也不是从《国富论》里面推出的，而是在经济大萧条的过程当中研究当时问题的本质和原因而得出的结论，再比如说熊彼特强调创新，但是创新这个词在《国富论》中是没有的，《国富论》只讲贸易分工。可见，后来这些大师的观点都不是从过去的理论观点得来的，而是按照亚当斯密所讲的，对所处的时代的问题是什么，决定因素是什么的研究方法。我强调回归亚当斯密，回归观点，因为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和国外的学者、大师所处的时代和条件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拿他们的理论观点作为我们的参照系的话，现象是不断在变化的，

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在研究经济发展的，但是《国富论》强调分工。分工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所处时代最大的差别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 1776 年出版的，用 8 年的时间完成，那么他从 1768 年开始撰写，写之前至少花了 10 年甚至 20 年的时间研究问题，所以他应该是 1750 年开始构思《国富论》的。但是在亚当斯密的研究之后，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 世纪之前世界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发达国家的每年人均增长是 0.05%，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以后迅速翻一番。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因为 18 世纪中叶出现了工业革命，纺织业的机械化。1760 年第一部机械化开始投产是在亚当斯密研究《国富论》之后。

亚当斯密的时代没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概念，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现象。实际上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从 18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国家的收入增加开始加速。18 世纪以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是非常小的，1700 年的时候最发达国家的国家是荷兰，人均收入以 1990 年的货币为单位计算是 2500 国际元。当时最穷的非洲国家人均收入 500 国际元，差距只有 5 倍。但是现在国家间的差距很大，因为发达国家出现了产业加速。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应的技术设施和制度环境也必须不断地改变。现在经济增长主要是人均收入突然间的加速。这个现象是技术不断升级的结果，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而这些是亚当斯密没有研究过的，不能让亚当斯密去研究一个在他的时代并不存在的现象。现在新的大师的观点都是违背亚当斯密提出的观点，或者是其没有提出的观点，所以不能认为亚当斯密没有说的我们就不能说。这也是我想与国内学界交流的观点。

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既然现在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计、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就应该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经济发展。在经济过程当中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政府、企业、家庭、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认为利润最大化，当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的时候，在可选择的范围内总是追求个人的利润最大化。经济学家所谓的理性就是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总是选择你认为最好的，我想用这种方式来研究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国家，为什么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不一样，什么因素驱动了这些变化。如果按照这种范式进行研究就是结构经济学。

但是为什么说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区别于之前的结构主义所以叫“新结构经济学”。同理如，道格拉斯诺思研究制度，本应该叫制度经济学，后来为什么叫新制度经济学？因为美国在 20 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区别制度学派叫新制度经济学。这里，“新结构经济学”也是这个目的。我想研究的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结构是由什么决定的，结构是如何变化的，如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核心的假设就是，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技术结构，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是内生决定的，但是内生决定什么呢？决定在每个起点上面的要素。我要讲的是一个新的视角，而且这个新视角是要发现从二战以后所忽略的内容：结构是要素禀赋内生决定的结果。内生决定和要素禀赋非常重要。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资本，劳动力水平决定了消费价格。所有的理论模型不管再复杂，到最后不是讲技术效应就是社会效应。发展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因为在某一时间点的要素禀赋决定了经济体的总预算和生产要素间的相对价格，总预算和相对价格决定了这个国家在每个时点上面可以用的最低生产成本。

为什么发达国家总是大力发展资本很密集的产业，因为劳动力相对少，相对贵。在可选择的产业当中，选择资本很密集的产业因其资本相对价格低，所以成本是相对最低的。其他国家如果选择同样的产业，则成本相对高，竞争力就不如发达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在资本很密集的产业就比较优势。如果所有的产业都是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最优竞争力产业，那就是最好的产业结构。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希望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劳动生产力水平就需要和他们一样高，产业结构也就需要和他们一样。但是结构主义忘记了一点：要素禀赋结构。要达到像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结构，每个劳动者所要用的资本就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多，并且不是说在少数产业上，而是在平均产业上每个劳动力所用的资本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多。

发展中国家普遍的现象是资本资源短缺，所以要提高每个劳动者的资本所有量。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产业结构提升，规模会越来越大，市场化会越来越大，交易价格会越来越高，所以必须要有相应的设施和制度。设施和制度的缺乏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我认为，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方式是按照比较优势方式，最优竞争力可以创造最大的剩

余。市场范围扩大，风险和交易量都会加大，必须有过硬的基础设施，必须完善道路交通建设。

企业家永远追求利润最大化。如何把理论的观念变成企业家的实际需求，必须有一个机制。在每一个时点上如何准确地得到相对价格，即竞争的市场。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才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才能够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使得企业的选择自动符合比较优势的变化。反过来说，如果比较优势那么重要，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因为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产业结构必须不断升级的过程。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他的成功并不只是由他是否有勇气第一个吃螃蟹来决定，还和是否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和相应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关。这些并不是企业家自己可以做到的。当很多企业一起做时，就存在一个协调的问题。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东西还是需要政府提供的，因此必须有政府。世界银行最新的《增长报告》中只提供了经济发展的“药材”而没有“药方”。其实是有“药方”的，“药方”就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前提是必须有有效的市场，价格才可以传达正确的信号。这个是增长报告理论中的第四个和第五个成功国家的特性。其他三个是按照比较优势的结果，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话，市场一定是开放的，并且要一步一步的发展，之后会面临巨大的竞争力。增长报告的五个经验其实背后都有一个“药方”，就是在每个时点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总结成功国家的经验都是实施了符合上述理论的政策。

结构主义为什么失败？我国要发展的生产活动是发达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误和寻租的现象。为什么在经济转型的时候华盛顿共识在理论上那么清晰，但推行的结果却正好相反？原因在于所有的转型国家都在过去的结构主义之下建立了一批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最终导致产业全部破产和大量失业，而政府即使私有化以后也不愿意让企业破产。比如，俄罗斯从国家实力上看是二等国家，但是为什么今天敢在乌克兰问题上和美国叫板，就是因为有国防产业。所以很多国家在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私有化以后还要继续给原来的产业保护补贴。我认为，根本原因是某些行业是国家需要的，有比较优势，因此就必须给予保护补贴。那么是在私有化时给的保护补贴多效率高，还是在国有时保护补贴多效率高？既然要保护补贴，那么不管国有的还有是私营

的都是国家埋单的。华盛顿共识反对政治对新进入的产业有协调性的补偿，比如智利在过去的 30 年间没有任何新的产业。为什么当时认为的最糟的制度反而结果是最好的，因为国家维持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

三、“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

新结构经济学家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改进经济绩效。前面所述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需要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技术发展是产业技术不断升级的过程，政府的支持对加快市场经济的技术研发、产业升级和经济多元化来说都很重要，因为需要有人来补充外部性，解决企业间的协调问题。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时，产业政策是个有用的工具。

1、追赶型产业的产业政策

我认为新结构的产业政策分为升级型的产业政策和追赶型的产业政策，发展中国家追赶型的产业政策，需要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处在国际最前沿的产业和技术。如果要维持这个产业的存在就需要技术创新，不断研发新产品和新技术，这是升级型的产业政策。另外有一些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变化，比较优势不断变化，也需要产业政策。

追赶型的产业政策是在追赶发达经济体过程中，政府要选择性的支撑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潜在比较优势是指经济体中，某个行业要素生产成本低，有成本优势，但其交易成本过高，以至于无法在本国或国际市场上竞争。政府一旦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就可以降低先行者的风险，减少交易成本，让这些企业可以生存。

在追赶成功的国家中都有产业政策。16 世纪的英国追赶荷兰，18 世纪末以后美国、法国、德国追赶英国，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追赶美国，60 年代亚洲四小龙追赶日本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这些国家通常在选择的时候要素禀赋结构大约相同。为什么必须有相同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相同，比较优势就相同。通常意义下，要素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自然资源生产密集型的产业，比如农业，如果要生产的话必须要有相同的自然资源的条件。制造业则只要看人均生活水平即可，因为要素禀赋的变化将带动比较优势的变化。如果连续二三十年都保持发展，资本一定会积累非常快，工资上升非常快。如果要

要素禀赋结构大约相似，生活水平差距不大，就是潜在的比较优势。

所以我提出追赶型的产业升级政策是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第一步，找出那些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人均收入高出国内一倍甚至两国的国家，或者是 20 年前收入水平与我国相当的国家，比如 1990 年时我国人均收入比大部分的国家比我们 20 年以前比他们低，但是我们现在人均收入是他们的 4、5 倍，还有与我国处在同一个水平的国家。从这些发展非常好，符合这个类型的经济体来看，他们的优势产业就是我国潜在优势的产业。避免政府犯错误或被利益集团寻租行为绑架。第二步，如果引进该产业之后，需要有一系列的产业是国内潜在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看一下国内有没有私营企业已经进入。如果有私营企业已经进入，则应该比作为参照性国家的成本低。如果比参照性国家的成本高，政府就应该帮忙考察到底哪些因素造成了高成本。第三步，对于那些没有本国企业或出口企业很少的产业，可以从第一步中选取的国家里寻求外商投资，或者启动新企业孵化项目。有一些产业在国内是全新的，没有潜在知识，或者是国内从事这种产品的出口企业非常少。这种情况下引进别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是为了引进或培育隐性的知识。第四步，除去那些第一步所选取的行业之外，政府还需要注意私人企业的自主发现，并为在新行业里成功的私人创新企业的扩大规模和新进入提供支持。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色资源，或者是新技术快速变动产生的新机会，而作为参照性的国家没有。但是如果有企业家已经发现这种机会，政府也必须帮他们解决在其发展过程当中或者是更多的企业进入本国当中存在的瓶颈限制。好处是从新技术和本国特殊的要素禀赋中受益。第一步是为避免政府犯错误，或者是政府被企业绑架，但是第一步里面的产业是否进入都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政府负责帮助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外部的协调问题。所以说政府和市场是两只手。第五步，在那些基础设施差、商业环境恶劣的国家，可设立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以此打破企业进入的壁垒，吸引外商投资，鼓励产业集群。发展中国家必然有制度的落后性，转移性国家必然有先进性，降低加工费用还可以快速的形成产业集群，前提是这些产业是有发展潜力的。第六步，政府必须有一定的外部性补偿，外部性的补偿只需要很少的资源，比如可以给予限时的税收优惠，优先贷款权，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补偿不同。传统意义上的补偿中，企业没有自身发展的能力，这里所说的补偿是企业有自身的能力。

2、国家领先型产业的产业政策

发展中国家或是我国这类中等偏上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国际领先型的产业，这些产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都必须依靠自主研发。直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基础知识研究绝大多数也是由政府支撑发展的，比如 MIH 美国健康研究院，MSM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不管是大学还是研究所都是政府资金支持。但是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因而也是进行有选择的支持，所以这些国家在生化，纳米等方面的科研资金多也是由于政府诱导所致。

发达国家在新产品的开发、基础科研上已经有突破了，新产品的开发基本上是企业来做的，企业做的时候政府并不是完全没有帮助。政府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产品研发之后的采购环节，通过政府采购可以很快的形成规模生产。单位生产成本低，在国际上就有竞争力。所以新产品的开发依靠政府，开发出来以后如何迅速达成规模生产，也是由政府发挥作用。

我国已经具有处在国际尖端，或者是接近国际尖端的产业，如家电产业，在此情况之下要做的是政府必须对基础科研提供帮助，支持大专院校，或者是支持同行业形成的平台技术知识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个机会，一些企业可以利用国外的基础科研知识的突破，结合国内市场的特性来研发新产品。政府帮助研发新产品时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样，援助一些基础知识的研究还有帮助采购。

另外，我国在新的开发上有一些是国防需要，但是量非常小。如果可以市场化的，应该是新产品的采购，而不是新产品的开发。如果新产品是国防安全上所必需的，就必须给予资金支持。所以要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简单的看表象。

3、失掉比较优势产业的退出型产业政策

对于失掉比较优势产业的退出型产业政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一些产业，因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工资上涨而失掉比较优势。除非是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对这类产业政府要创造条件，让有能力的产业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即研发和品牌阶段。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阶段的产业政策就很清楚了。中国现在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变迁来持续提高收入水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以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制定产业政策以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竞争

优势的产业。政府的产业政策需要根据现有产业和世界产业前沿的差距特性，按“新结构经济学”中产业政策的框架来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

四、结语

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研究的“金矿”，但其中也会有一些问题。如果这样的理论创新可以帮助中国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是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帮助的。只要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私营领域，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利用后发优势，每个发展中国家就都有潜力高速增长数十年。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政府的产业政策想达到这种结果，就必须改变过去的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发展思路。建立发展中国家欠缺而发达国家已有的产业，建立结构主义提出的现代大型资本密集的工业，建立发展中国家做不好而发达国家能够做好的产业，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休克疗法”来改革营商环境和政府治理。利用第三波发展经济学新思潮，即新结构经济学，让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现有的要素禀赋，和能做好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



林毅夫教授做主旨报告



林毅夫教授与我院院长干春晖亲切交谈

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上海高校智库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干春晖教授主持发言

【第一部分：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能再次邀请到林毅夫教授来演讲，还清楚地记得在 2007 年的 10 月 8 号上海财经大学 90 周年校庆之际，我也曾邀请林毅夫教授来财大做过一次主题报告。当时是林教授在英国作完马歇尔讲座之后与赴世行履职之间，我们荣幸邀请林教授作过一次报告。我还记得，林教授当时报告的题目是《寻找经济发展的终极可变因素》。众所周知，林教授是前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教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多年以来，林教授一直致力于回答经济学的“卢卡斯之问”——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密和机制到底是什么？”

林毅夫教授亲身经历了东亚地区的两次发展奇迹，一次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台湾地区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实现了经济腾飞；另一次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林教授对后发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林教授不同于那些所谓的“黑板经济学家”，而是透过各国经济发展的现象看到其内在逻辑和本质，并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经济发展的实践做出经济学理论的开拓和完善。从芝加哥大学学成归国后，林教授发现中国的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并不符合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认为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但他并没有借此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路径错误，而是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逻辑，中国实行的渐进、双轨的改革一方面为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并因势利导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这种方式能够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实现经济稳定和快速增长。林教授同时也注意到了中国实行的“赶超战略”的问题和缺陷，因此他建议实行比较优势战略，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在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林教授得以观察和了解到更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他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结合起

来，从中总结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及政府如何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正面作用。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不能用简单的主张进口替代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侧重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加以指导，事实上，这两种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并不成功。经济学理论的作用是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当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经济发展的实践时，就需要对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或是创立新的理论。林毅夫教授将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思考和研究成果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以区别于前两版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是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禀赋，促进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通过“有效的市场”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从而形成竞争优势，通过“有为的政府”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二者缺一不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正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各级政府则动员其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完善基础设施，引进外资以克服社会资本短缺和其他无形约束，“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和“世界工厂”的地位。

“新结构经济学”通过分析、提炼二战以来成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搭建了适用于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实现了经济学理论“认识世界”的任务，同时也将理论应用于“改造世界”的任务，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结构变迁的动态机制中发挥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作用的框架，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发现、培育和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帮助政府减少错误，提高决策正确性的概率。

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以后，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争论，世界上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这些经济学大师把林教授

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作为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里程碑，把林教授列为经济发展领域的世界级的杰出专家。同时，林教授的这个理论在国内也兴起了研究学习的热潮，我们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的每一位专家学者都认真地讨论过林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今天有机会请林教授到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来做主旨演讲和讨论发言，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就在今天，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讨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中国经济进一步的转型和升级。下面请林教授介绍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之后请在座的专家学者围绕“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做更多的研讨和讨论。下面，让我们热烈欢迎林教授发言！

【第二部分：结语】

在讨论开始前我对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做了一个理论的总结，主要也为了表达我院研究团队共同的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想法。最后，在讨论结束之际、媒体互动环节开始之前，我还想说几点，核心内容是有关中国如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以及这样做的原因和这样做的方法等问题。

第一点，我想先回应各位在座专家的发言。首先，为何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这部分恰恰是学生在平时学习中感到最古老、最陈旧、最不感兴趣的一部分。在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产业结构被认为是内生的内容，不需要单独被研究，同时产业政策也被认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是一种跟政府的干预相等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这个话题进行讨论的原因何在？在我看来，中国和西方现行的国家的实际状况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想加快缩短和先进国家之间的距离，就必须要有理论的自觉去探索西方国家先进的原因、发展规律以及制度的规定方式。在此之前，有一些经济学家曾对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了集中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后发国家处于何种阶段、如何赶超，以及如何利用较少的资源、较短的时间去努力缩小和先进国家之间的距离。在这个问题上，一般的先发国家是没有动力去研究的，所以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之一就更应该有合适的立场来研究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的问题。

第二点，各位专家讨论中提到了动态比较优势的问题。每个国家都希望站在

产业发展的前列从而赢得未来，同时这就意味着国家所选择的当下所需要支持和发展的产业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资源禀赋所给予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逐渐上升等一系列原因，我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正在逐渐失去原先的优势。从海关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中国所获得的出口中间份额越来越少。中国的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在进口结构中机电产品、机器人、自动化设备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不难发现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机器人使用国。所以，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具有未来发展前景的战略性产业，即使这样的选择有可能会偏离现存的比较优势。

借由本次圆桌讨论的机会，我想请问林毅夫教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应该以多大的偏离程度去选择具有未来发展前景的战略型产业，如果偏离过多显然是会产生问题，那么如何平衡使得产业既能够发展又能够形成比较优势？第二个问题，当我们在研究中国现有一系列的经济改革的措施的时候，是不是应以边际收益较大作为优先考虑的依据？是不是应该遵循某种规律来规划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方法和先后顺序？

按照产业经济的理论，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成功与否，都是有赖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而成功的结构转型则有赖于拥有能够成为支柱产业的工业，我想在座专家们所提到的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今天这个很特殊的日子，我非常高兴能够举办这场精采的圆桌讨论会，与在座的专家学者们围绕产业经济尤其是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交流了很多的想法和思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在此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这两者边界条件的立案反思。有时候说政府做好，有时候又说市场做好，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哪个效率高就用哪个，但如果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个边界又会变得相对模糊，我想“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来考虑。

今后，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高校智库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都将继续就中国的产业发展、产业政策以及产业结构转型等问题组织一系列的论

坛和活动，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最后，再次感谢林毅夫教授，感谢各位专家的讨论学习和各位媒体朋友的热情参与！谢谢大家！



我院院长干春晖主持发言



圆桌讨论会实况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教授发言

【第一部分】

首先，非常感谢干春晖教授做了一个非常系统、简要且提纲挈领的介绍。关于“新结构经济学”和由“新结构经济学”所形成的观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完成追赶还是继续领先，都应该有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中所倡导的“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的作用。

在当下这个时刻来讨论产业政策，是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五年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断递进的过程中，双轨渐进式的改革必然会在政府转型的过程当中发挥不小的作用，包括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取得了经济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三十五年中平均每年 9.8% 的 GDP 增长率，平均每年 16.3% 的对外贸易增长率，把中国从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人均收入达到 6800 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今年可能超过美国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

在这个过程中，还没有发生严重的、系统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在大国当中、在快速追赶的国家当中只有中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也不能否认在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社会和产业中也有一些问题，社会方面存在收入分配问题、腐败问题，产业上面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污染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所以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政府的干预造成的，主张政府全面退出。在我们的经济转型过程当中，过去各个地方在地区产业发展上面有很多非常好的做法，包括工业园、高新科技区、经济特区、招商引资等，这些政策在转型过程当中本来基础设施非常差、制度环境非常差的情况之下，动员政府有限的资源来创造局部有利的条件，降低了各个地区所要发展的主导产业的交易成本，可以很迅速地把当地在要素价格上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的产业，这才有过去 30 年中我们取得的稳定、快速的发展。

中国确实有不少的问题，但是是在一个不完善的经济当中，面临两难选择当中择优选择所导致的。虽然从标准的理论来看那些政策都有问题，但是在这种扭

曲的环境之下它是有效的。那么应该讲我们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政策，不可能实现连续 35 年稳定快速的发展。当然条件是在不断变化的，过去正确的政策并不代表永远的正确，也需要不断改进。但是现在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看到社会和经济当中存在不少的问题就把过去的作为全盘否定，包括政府在过去经济发展当中的作用，以及各个地方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政府发挥的作用，利用产业政策的因势利导作用全部否定。在今天这样的理论背景和学术背景之下，上海财经大学两个学院一起组织讨论产业政策，我认为是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的意义。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我主张产业政策是必要的，而且必要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理论并行。首先历史地来看，绝大多数的国家产业政策是错误和失败的，造成了很多人反对任何的产业政策。这次我到世界银行，进去以后马上发现讲产业政策就代表你这个人落伍的、是不对的。因为确实有绝大多数产业政策推行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但是从历史上看，所有成功实现追赶的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政府都有产业政策去扶持他们要追赶的产业。从 16、17 世纪开始英国追赶荷兰，到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变成最先进的国家，美国、德国、美国、瑞士等国家追赶英国，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的日本追赶美国，还有东亚其他经济体追赶美国、追赶日本的过程中都有产业政策，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没有产业政策而追赶成功的国家。

成功实现的追赶达到发达国家的阶段，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是在实现追赶以后，政府同样积极干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方向，虽然方式上会有所不同，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政府同样给优先发展的产业提供一定的扶持和帮助。现在既然产业政策绝大多数是失败的，这点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如果没有产业政策也不会成功。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研究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以及什么状况下这个产业政策可能失败，在什么状况之下产业政策成功的概率比较高，我觉得这是有相当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来讲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因为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不断转型升级、相互适应的动态结构变迁的过程。在动态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在技术和产业方面必须要有先行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不管失败或成功，都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因为如果失败了，那么第一个失败的人承担所有失败的成本，但如果成功了，后来者则会蜂拥而至，除非存在专利保护，否则竞争导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利润大幅度减少。那么怎么样来补偿外部性，使有人愿意做先行者？第二个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升级，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风险不断加大的过程，面对市场融资的需求，还有交易的对象个体性质的变化，必须要有基础设施，必须有金融，必须有法律、商业环境的配套改善，但是这些改善都不是单个企业者作为先行者能够解决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相应改善，先行者失败的概率会非常高，没有企业或个人愿意做先行者。

任何的先行企业很难寻找其他的企业一起承担先行者的风险，在这种状况下不是政府来协调，就是政府来提供。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一个收入不断提高的过程，其背后是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不断变迁的结构变迁过程。如果政府的资源是无限多的，可以把所有可能的外部性都予以补偿，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制度环境都一次性完善，这种状况之下政府不需要挑选任何产业政策。问题是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这种状况之下有限的资源要做最重要的配置就必须做有针对性的选择，这就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成功需要什么前提呢？前提就是政府帮助企业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以后，企业可以自主经营，在市场有竞争力，这样的产业就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产业符合比较优势，那么要素生产成本在全世界最低，如果政府的协调是帮你解决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如果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最低，交易费用又是最的话，总成本就最低，那么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就具有竞争力，所以应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这样就形成了政府要利用有限的资源，怎样选择那些从要素生产成本角度是具有比较优势，但是从交易成本角度没有达到比较优势，还没有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那么这样的状态之下，第一类是追赶型国家，追赶型国家的产业和发达国家现有的技术和产业相比差距较大，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可以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发挥后发优势。新结构经济学中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六步法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迅速形成产业集群，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第二类是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开始追赶其他国家的时候政府都发挥了积极有为的作用，那么如果你仔细看他们

政府的干预方式基本上是我在“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中所讲的那些方法。但是它们现在已经达到世界最前沿，他的产业和技术已经处于世界最前沿。另外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退出的产业，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特性必然让它不可能再处于资本过度密集的状态，所以发达国家资本丰裕以后自然就退出了那些产业，如家电产业。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本上都是处于世界最前沿，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产业在世界最前沿，如果要留在这个产业里继续发展，就必须在这个产业里继续创新，使新产品的不断的涌现。在最前沿的产业中，任何的创新都是发明。发明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基础知识的研究，研究以后产生新的技术，在生产过程当中可以应用；二是新产品，这个属于开发。研究的部分属于公共产品，发达国家即使发展芯片产业，研究方面基本上还是政府投入，只有在新产品的开发上面是由企业完成的。我最近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书叫做《企业家政府》，政府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本书研究美国在世界上领先的产业，包括生物制药、纳米、移动通信技术等，发现基础科研基本上都由政府完成。比如说苹果的乔布斯那么有名，苹果的盈利方式是把由政府所做的科研突破的技术成果组装成产品。苹果的任何一代产品里面没有一个核心的技术是苹果发明的，都是由政府资金支持的科研人员发明的。政府的科研资金是有限的，不管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或者是美国健康研究院资金都是有限的。有限的资金必须考虑配置问题，所以实际上它是有产业政策的，不过它的发展阶段和我们不一样，产业政策和政府扶持的方式不一样。

如果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经领先了的这些产业，如果要在世界继续保持领先，同样要有基础知识的研究和新产品的开发。新产品的开发需要企业，但是基础知识的研发政府必须支持。而且新产品出现以后，要马上占领国际市场必须要有很大的规模生产，所以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帮助新产品可以很快地进行批量生产，降低交易费用。所以第二类适用于产业已经处于世界最前沿的产业政策。那么发展中国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弯道超车”，就是有一些基础知识的突破和新产品的研发。在新产品的研发过程当中，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中国的市场特性和发达国家的市场特性有差异，我们的企业家有可能利用发达国家的基础科研所形成的公共知识，结合我们国内的市场需求来开发新产品、创造新业态。这个里面最有名的是阿里巴巴和微信，阿里巴巴和微信都是应用，基础科研成果都是

现成的，甚至产品的功能在别的国家已经出现了，只是尚未在中国应用而已。以微信为例，微信的大部分功能和 Facebook 一样，只是从电脑的平台变成手机的平台，但手机平台的趋势也不是微信首先发明的。阿里巴巴也是如此，它全部都是互联网的技术，而且阿里巴巴任何一个业态都只是在在中国的大规模应用。这些企业做现有技术的应用的时候首先要有企业的精神，但是各个地方对其还是有产业政策的，有一些政府是不管它，但是有一些地方政府还是扶持它的。比如说深圳，广东对腾讯是有扶持政策的，杭州也是，所以还是需要政府和市场两个共同的作用。

第三类就是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很多产业需要退出，比如过去上海是轻工业非常发达，现在上海人均收入达到 25000 美元，这些产业已经失去比较优势，怎么样帮助它们有序地退出？如果总部仍然留在这个地方，继续做附加价值比较高的品牌、研发、渠道，生产部门则转移到其他收入比较低的地方，过去很多时候可以在国内进行产业转移，但是随着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很多产业只能向国外转移。像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很多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成衣业，纺织业，电子业转移到了日本，60 年代以后日本发展起来以后那些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80 年代那些产业转移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现在也到了应该将这些产业转移到海外去的时候了，总部留在国内转移至微笑曲线的两端，生产分布在国外，由 GDP 变成 GNP。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企业和政府合作，这些都是产业政策。具体的内容则需要更细致的研究，也要结合各个地方实际的状况来做。所以我觉得今天借这个研讨会，把这个题目提出来做一个开题，然后怎么样深入去研究。我觉得这个研究出来，应该对我们经济学家有理论创新的机会，可以对我们自己的学术发展做贡献，而且有很强的实践上的贡献。因为大部分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当然这是我们必须去避免的，但是没有产业政策是不会成功的。因此既然需要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哪些做法可能是失败的，我们应该建议政府不要做；哪些政府不做是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建议政府去做。我想这样做有利于帮助我们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还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掌握他们的机遇和命运，实现我们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世界大同”，按照我们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希望发展中国家可以和中国一样有快速发展，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用好的情况之

下，每个国家都能够快速地发展他们的经济，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实现他们的现代化，在中国梦实现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梦想。今天的这个讨论会开得非常好，尤其在当前的社会和学术的舆论环境之下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价值。

【第二部分】

我觉得三位学术界的朋友都认真地思考过我这个命题背后的逻辑，认识到有所欠缺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讨论使我个人收获很大，而且对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深化，以及在我国的应用都有很多帮助，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提出了几个问题，我觉得我也应该回应几点简单的自己的认识。

第一点，周振华教授和张晖明教授提到了空间结构的问题，其实空间结构的问题同时也包含在“新结构经济学”内，我觉得各个地方经济发展之后必须按照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中国空间这么大的地方，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必然有差异，沿海地区在要素积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方面和内地是有区别的。沿海地区离国际市场比较近，内陆地区离国际市场比较远，各地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都是有差异的。因此形成了产业的布局必然要有空间上的差异，虽然在介绍的时候我没有强调这一点，但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和理论的一般原则来看，应该是把空间特性包含在里面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关心的和他们能动用的功能手段，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地方政府政策就没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非常有限，地方政府不能负债。这些东西虽然在“新结构经济学”里面没有很明显的提出来，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融入进去的，可以让“新结构经济学”在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或者是其他国家现实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个框架。但是如果经济有竞争力，那生产的产品一定是符合市场需求，质量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或者成本足够低，那唯一的方式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技术不断的创新，产业不断的升级，资本不断的深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硬的基础设施，软的技术设施要求越来越多，所以必然有外部性和市场失灵。我觉得一般原则还是适用的，但是牵扯的领域和我们以国家为研究对象有一些不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补充。

第二点，刘志彪校长谈到产业政策，在我看来，有的产业政策是决定产业的生，有的则是决定产业生出来以后怎么更换，有的则是决定怎么帮助产业死，也

就是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在追赶型的产业政策里面，政府大概划定一个范围，这个范围里面的产业是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但是已经涵盖了所有进入的企业，因为我前面讲到过三步，第一步是国内已经有企业进入这个产业，第二步是比较优势的产业国内没有企业去做、或者是只有很少的企业在做，第三步则是一些国家会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和特殊的比较优势、或者是技术快速变迁的时候会创造一些新的机会。第二种类型是决定某些产业如何生的，如果技术水平已经是处在全世界最前沿位置，就要有新技术、新产品，而不管是新技术和新产品都是发明，发明要有基础知识，也要有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第三种类型是决定某些产业何时死，在我看来如果分析表明某些产业没有生的希望，那就应该通过政府政策的制定更快地淘汰这些产业。

第三点，张暉明教授讲到突破新古典的说法，我想应该指的是突破新古典的研究领域，但是我采用的还是新古典理性的研究方法。以我的老师之一加里·贝克做为例子来看，他突破了传统新古典的研究范畴，他是研究社会、研究政治的，但是他同时是用理性的方式去研究的，他的突破在于对研究领域的突破。另外，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也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突破，是因为过去新古典的研究方法不研究制度，而他则用理性的方式去研究制度和制度的变迁，所以他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突破者，但同时他所突破的仅仅局限在范畴。我的研究也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突破，是因为目前的西方主流的研究当中它是不研究结构的，而且不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差异，我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且这个结构又是内生的，不是像结构主义所言是外生的，这是对新古典主义研究范畴的突破。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我还是认为所有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已经尽量选择他认为最好的。在研究“新结构经济学”时，我认为我是用理性人的方式来研究问题的，所以我的研究还是涵括在新古典整个总体的领域里的，但同时我把研究的范畴扩大到了结构。

最后，谈到政府抓项目的问题，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抓项目其实是很容易的。现在全球的人均收入约为 25000 美元，德国则在 100000 美元左右，德国的制造业比重占全国 GDP 的 22%，中国大量从德国进口汽车以及大量关键设备，在这个条件下，上海的汽车制造业其实可以把德国现有生产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零部件招商引资进来。又比如上海的造船业，从吨数来讲排行世界

第一，这些产业应该由政府支持的。除此之外，上海一些传统的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也可以帮助这些产业转移出去。过去抓项目相对容易，因为原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段，而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段已经过去，地方政府如果要在抓项目上下功夫，我觉得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可以分成两部分操作：一、第一类产业还处在追赶型阶段，我国应该向可以作为参照系的国家进行招商引资、合资或并购去引入一些相对成熟的产业；二、第二类产业已经处在领先阶段，政府就可以帮助企业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并明确好政府和企业的职责范围，促使缓慢且稳定的转型。政府要发挥好的作用，除了保持宏观稳定之外，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可以作为判断如何在产业结构方面发挥好的作用的一个依据和参考。

【第三部分】

首先，我想对于春晖教授和鞠建东教授的问题做几点回应。

我非常同意“在讨论开放的时候必须了解开放的目的、在讨论改革的时候也必须了解改革的目的”这一观点，这两种做法都是为了让经济更好地发展，且都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最终目的。

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首先就必须去了解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在这之中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理论创新和理论自信。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 200 多个发达国家，我没有看到一个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来做发展而使改革政策成功的案例，虽然西方主流理论中的政策从理论层面来看是非常完美的。而成功的不管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转型国家，他们所推行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都是背离的。因此，我会选择更为行之有效的政策，而不会选择理论正确但效果平平的政策。日本等国家的成功案例的背后，我们可以了解到成功的道理，那就是理论创新。

目前最热门的话题是“资本帐户开放”，我是不主张资本帐户完全开放的，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并不看好。其实，在我看来，对发展中国家有帮助的资本是投资在实体经济的资本，而非由中国企业家到国外借钱。所以，讲到资本帐户是否开放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以中国为中心来讨论开放、以中国为中心来讨论改革，并且讨论的时候不能简单用西方理论作为参照，而必须根据实际的中国国情、问题本质等决定因素来考虑，这仍然牵涉到理论创新。

权衡教授在刚才的发言中也提到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新结构

经济学’是否指政府是为了让市场发挥更好的作用？”。在微观经济学中，讲市场是越竞争的市场越好，但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是没有技术创新、没有产业升级的，是给定了技术和产业状况的。但如果是在一个技术和产业不断变迁的状况之下，市场就不是简单的越竞争的市场越好了，因为这当中一定会牵涉到很多的外部性问题。所以，“有为政府”只是帮助更好地运行“有效市场”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另一个问题是“潜在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之间有没有差异？”，我想这两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因为传统上讲动态比较优势，干教授刚刚的讲话中也谈及，即在一个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来临的时候必须掌握先机，这个思想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讲叫做“迎头赶上”。但在谈潜在优势的时候，就不仅仅包含抓住新的机遇，而我有一个原则是找一个收入大约在中国一到两次的国家，借鉴引进它的产业比较优势。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高铁，高铁的基础科研是借鉴的，技术组合是我们完成的。另一个例子互联网，无论是微信还是阿里巴巴，我们所做的都是产品的开发而非基础科研。这就说明，应用研究相较于基础研究，更为符合中国市场的要求。

再以上海的造船业为例，上海的造船业已经接近世界最前沿水平，如果造船业要有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那就一定要由上海来在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所以，在我看来，潜在比较优势和一般动态比较优势的差异就在于，一般动态比较优势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做新的突破，利用新的突破产生新技术新产品，再利用新技术新产品引发新的产业。尤其是在国防安全上，技术成功的概率极高、政府发挥的作用也极为明显有效。

最后，非常感谢在做各位专家的热烈讨论！谢谢大家！



林毅夫教授在圆桌讨论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

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理事周振华教授发言

我非常赞同林教授的发言内容，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而且我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对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研究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是一个急需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对于结构的解释是非常新颖的，但总体还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之内从微观基础的分析开始的。但是我的研究有一点另类，有一点超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因为我在研究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过程当中发现中国的情况、中国 30 年的经济奇迹和发展，单纯从一重结构上面来分析还不够，必须引进另一重的结构——空间结构，也就是区域结构或地区结构。从双结构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很容易解释的，我想经历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学者对这个命题都是深有体会的，但是要把这种研究方法纳入到西方主流的范畴里面就比较困难，因为空间本身不在主流经济学范围内。但让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这 30 多年来尽管也有所发展但没有重大的理论突破，而空间结构经济学近十年来却发展得非常迅速，特别是在引入了网络空间之后。

所以借由今天圆桌讨论的契机，我想从双结构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谈产业政策，其实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双重的，中央政府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实施产业政策的制定者，而且有时候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并不一致，这种状况就引起了平抑作用。平抑作用指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结合当地情况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可能会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可能可能会出现负面的、消极的效应。如果单纯从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来看，正如林教授所讲可以找到助推中国经济起飞成功的政策。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从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从空间结构上看，中国的改革是双轨、渐进的改革，是从最早的四个特区、到沿海城市、再到沿边沿江地区，包括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是先做试验区、再逐渐推广。

在制度变革过程中，除改善了总体体质的质量，在空间结构方面也显现出相

当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特别在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之后，区域经济趋同性不断提高，地方政府政策也会趋同，这也会为现在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问题。另外，制度变革发展到现阶段，进入所谓的“法制”、“治理结构现代化”阶段，地方政府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压制。

当然，自贸区在制度上的突破受到很多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制，这就是需要更多授权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可能会逐步减弱，其中的风险很大。林教授今天并没有谈未来的发展，但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比较乐观的，我看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根据收敛理论，中国的人均 GDP 和发达国家之间仍还存在比较大的追赶空间，在未来至少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都会处在一个中高速增长阶段，理论上的潜能是存在的，但要将这种潜能真正激发出来，还需要更好地结构配置效应。中国过去的 30 年的制度红利都是改革带来的，但体制改革是通过结构配置效应调整作用于经济的，因此未来中国经济是否维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就取决于结构配置效应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改革开放是否能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需要排除的制度障碍将会集中在服务产业。在过去 30 年里，大量的制度变革对促进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但这种制度已经无法很好地适用于当下服务业的发展。不论是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还是服务业的行业管制，都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被限制现象。因此，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试验的重点就在于如何使得服务业进一步开放，以及如何将服务经济中有关市场准入、市场监管、市场秩序、社会信用等方面的制度障碍消除。

在未来，产业政策的内容也会从过去的工业化为主，向服务经济和服务化为主发生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如何破除制度障碍，并进一步释放和发挥好结构配置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能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速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理事周振华教授发言

南京财经大学校长

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理事刘志彪教授发言

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解释了中国 35 年经济的增长，并从现实出发总结了中国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比较成功的轨迹和经验。我感到非常赞同，想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补充。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负面清单的管理，主要是体现产业政策而非竞争政策。中国过去的产业政策在我看来有四个特点：第一，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挑选输家和赢家的政策，是一个优生而非优育的政策；第二，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西方学者所研究的产业政策不同，并非完全是中央化主导；第三，中国的产业政策是以结构调整为核心，而非以创造市场环境、公平竞争为主；第四，中国的产业政策是纵向而非横向的。

我想就中国的产业政策非完全中央化、地方化的混合性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谈一些看法。必须首先指出的一点，中国目前的经济奇迹与房地产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各地区典型的经济增长现象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大都是用土地优惠开放开发区吸引外资，同时对外资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在抬高土地价值之后，地方政府通过房地产取得高额收入，再返回来利用房地产的收入继续支持开发区建设，同时开发渠道发展不断带动地产行业。

我想重点对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提供几点参考，对中国的产业政策非完全中央化、非完全地方化的混合性质对中国产业政策及经济增长的影响谈一点看法。我觉得中国目前的经济奇迹有一点必须重点指出，中国经济奇迹与房地产有关，在一定程度上是房地产支撑的奇迹。从各地区典型的的增长现象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是拿一部分土地拍卖的资金搞一个开发区，用土地优惠吸引外资，并对外资进行补贴。将土地价值抬高后，通过房地产取得高额收入，然后用房地产的收入继续支持开发区建设。所以地方开发的思路一般是先找房地产，用房地产业支持开发区建设，开发区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地产行业。如果从数据上来看有两个数据要注意：第一个数据，中国居民目前资产的 70% 以上为房地产，而美国居民目前资产的 70% 以上是不同的金融资产；第二个数据，中国房地产的产值占全国 GDP 产值的 20%，按照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来算，

每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量中有接近一半来自房地产的贡献。也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增速下降是由于房地产降温，产能过剩主要也是由于房地产产业的过剩，甚至是所有行业包括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家电等都与房地产息息相关。房地产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的原因要追溯到 1993 年朱镕基总理实行税改后，形成中央政府获得增值税收入的 75%，而地方仅获得增值税收入的 25%。相对来看，地方政府缺乏资金却承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到重任，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开始以来土地财政，也就导致地方政府把产业政策的重心放在房地产产业上，因此中国经济目前的房地产的依赖度很高。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香港，香港的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比重也很高。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说香港的问题是房地产、航运、贸易占比高且创新匮乏所导致的，所以我想一个城市的经济出现问题，应该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房地产比重过高，二是社会精英长期自我感觉良好。而非地产类的企业则严重缺乏资源，因此拉高了整个社会的利率和使用资金成本。同时对政府而言，政府陷入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土地价格、房地产价格都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房地产价格的下降会直接导致土地价格的下降和财政收入的减少，而这就引起巨大的金融风险。中国目前经济领域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是资本市场的问题导致的，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很多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服务业发展滞后也与房地产有关，房地产价格过高使得进城务工人员只能到小城市工作，因为大城市房地产价格、租金、生活成本都过高。

因此，中国的房地产产业如果要回归正常的产业利润，就要解决地方以房地产为导向的产业政策的发展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投放货币刺激，也要对经济结构有重大的调整。我认为，现在最有可能抑制中国地方政府对房



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理事刘志彪教授发言

地产的依赖的方法，就是在税收改革中把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部分和中央获得的部分税收对换，尤其是发展服务业的税收收入要返还给地方政府，以提高地方政府发展服务业的积极习惯，这个对换过程应该处在一个循序渐进的状态，时间周期约为五到二十年。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教授发言

我是非常赞成产业政策的，因为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当你只有一只手去驱动经济的时候，和两只手驱动经济效果肯定不一样。我同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觉得林教授在结构经济学中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因为经济学本身是从时间延续的序列角度分析，但由于发展阶段特点的量 and 质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特定的阶段，尽管时间上是连续的，但是结构性问题凸显，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周振华教授也补充了一些结构分析中空间结构的分析思路，我想再补充一个结构——功能结构，作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工具和手段，这也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里面始终困扰的一个问题。从十四大开始提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很多官员其实并没有理解这个概念背后的机制，所以工作方式并没有发生转型。提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需要先研究市场发挥作用的方式，然后再研究政府之手发挥作用的途径。

我想补充的第一个观点，除了一般时间序列的连续分析的阶段特点还有空间结构，同时还有与转型经济体相关的体制转型本身，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功能关系的结构。这是我们今天在讨论中国经济，或者是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转型问题，这个是我想补充的观点。林老师今天建构的分析框架，我觉得不仅挑战主流经济学，同时也挑战传统政治经济学。林毅夫强调过“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我在想今天我们能不能对主流经济学框架本身有所突破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这个可能的很重要的必然因素是今天是新全球化阶段。如果我们对比在过去几个主要经济理论成长成熟的历程和背景来看，当年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那个时候全球化的水平是英国引领的，因此亚当斯密所提的自由主义是完全符合国家战略需要；而在当时情况下德国历史学派是非常有个性，完全符合自己国家的利益。中国 35 年的发展，恰恰是以主动开放和融入全球化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工作内容，因此不同于美国学派，也不同于德国的李斯特的历史学派，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突破主流经济框架是个问题。如果能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比如引入空间分析或者引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关系，那么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框架上就能有所突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同区域之

间的差异特点实际很大程度上也是代表着许多非洲小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可以形成我们自己的大国背景下区域分析的理论。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突破主流经济框架的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真正地展现出由中国自身改革成功的事件所提炼出的新经济理论，并且这个新经济理论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普遍价值能力。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软实力就可能与中国的硬实力，且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匹配。

第二个观点，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为一个转型国家、追赶型国家、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带有概论性的基础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从一般的发展阶段结构问题，转变到空间问题、转变到体制功能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于这种复杂结构的本身，如果我们将其进一步具体化，进而讨论我们的产业政策的设计，必须分解中国经济社会当中多维、多元、多组合、多形态的各类结构，包括各类结构在体制功能的组合上所形成的自适应能力，我觉得经济转型的重点就在于各类具体结构内容上的自适应能力。目前这种自适应能力存在的非常严重的不平衡现象，某个领域的自适应能力是短缺，而另一个领域的结构功能比较强大。比如说今天要说产业政策，政府的功能就非常容易发挥出来，市场的能力就不太容易发挥出来。如果发挥政府能力，有为政府又依靠何种因素去加以配套，因此今天我们延续的是传统体制惯性。因为今天的老百姓、企业家精神不足，所以个人和企业家行为上对政府的依赖的思维惯性非常强大，如果这种强大的思维惯性与政府容易干预经济之间的行为形成互动的話，就制约了体制转型的能力。我认为林教授在研究“有为政府”的时候，对“有为政府”自身作用的配套条件上需要深化，这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碰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转型攻坚期遇到的一个深层次问题，还是一个关于思维方式、知识结构、法治精神的问题。

第三个观点，我很赞成设置产业政策这个研究领域，同时我更关注产业政策设计当中发生的具体的内容和功能之间的匹配问题。产业政策的设计，对如何处理长期目标和阶段目标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央政府目标和地方政府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关系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当下，地方政府虽然在纵向行为上服从上级政府的宏观统一政策，但却在行动上规避，这种行为的正向作用在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相竞争更强、反向作用在于竞相招商引资带来的

资源外流现象。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之间、在不同行政隶属关系的国有企业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制度差异，因此，我们需要在理论上更加深化、细化、归类、梳理清楚这些问题。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讨论产业结构调整 and 产业升级的同时，必须讨论的产业政策的相关设计。



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发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副所长

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理事权衡教授发言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我主要想在林教授发言内容的基础上再补充三点。

第一点，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意义和价值，探讨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陆经济、台湾经济和新的主流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时，能够获得一些提炼与启发。我认为林教授现在就是在尝试做这方面的努力，而且这方面的工作是符合完整的国际框架体系的，同时也是在推动发展经济学升级 1.0。发展经济学升级 1.0 是指在早期新古典主义思路框架下，强调政府优先从市场退出。最后就会导致一个结果，类似东欧、前苏联等国家的转型失败，或是类似拉美国家陷入“拉美陷阱”。实际上，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包括日本、韩国在整个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都参与其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分两类：一类是欧美方式，称为二次调节；二类是东亚模式，称为二元调节。所以，政府无论是在大陆经验、台湾经验或是日韩经验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点，“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很重要的创新点，就在于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纳入到了有效的市场模式分析当中，这其实是为了弄清更有效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子的。早期的四种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证明越竞争的市场越有效，但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中，在凯恩斯提出“政府干预”的概念以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再是竞争和垄断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在用已有微观经济学研究有效市场问题的时候，市场结构的分析内容应该从原来的竞争和垄断的关系转变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在说到有效市场的时候，不仅仅要说原来的竞争和垄断哪个好，也要说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应该就是林教授提出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概念的意义所在。

在现在这个阶段，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林教授提到台湾早期的经验以及中国大陆的最新经验，我认为也还要借鉴日韩的经验。所以，如果政府有好的产业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结构政策以及技术政策，才能更好地引导产业的发展。再看拉美的经验，之所以陷入中等陷阱，与早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拉美国家的政府参与市场就有所不足。再看印度的

经验，印度制造业从原先的 15%提高至 25%，不得不说是新总理政府的一大作为。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找出自己的优势，在我看来就是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马来西亚中等收入 28 年的历史，南美十几年，二十年中等收入就上不去了，经济学家说这是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如果和早期成功跨越这个陷阱的国家看，他们是政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南美陷入这些陷阱的国家政府的不足和缺失有一些原因。我们再看印度，印度的制造业有 15%，所以新的总理上来要制定印度新的制造计划，要在 10 到 15 年把制造业从 15%提高到 25%。那么中国怎么样同样的崛起，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最高达到 49%，这个是中国比较重要的优势。

另外，参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如何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一般讲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候，核心问题是讲创新，而讲到创新就必须讲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做好创新这个环节的前提，必须具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或者是市场决定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决策中占有的比重。林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反复强调了一个概念，即因势利导和塑造比较新的比较优势。如何挖掘新的比较优势、如何分配这部分新的比较优势，这应该是给“有为政府”的一个新的课题。

第三点，如何在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型方面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更好的条件、营造更好的环境。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一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发现，12000 多家企业远远超过了保税区的总额，原因是政府的职能转型，即审批制度等方面



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理事权衡教授发言

面的改革。而且，我认为在企业生长出来以后，政府如果可以帮助培育这些企业，

要对这些企业负起责任。另外，在产业的开放方面，必须为这些企业扫除一些壁垒，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开放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开放当中全球化服务业竞争才会导致服务业的质量的提高。所以，我认为必须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研发投入、法制等环境的营造方面，尤其是在腐败对经济是好是坏的问题上，我认为反腐可以增强企业家的信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结构经济学”能够在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中更加突出“有为政府”的作用，当然与此同时，政府必须改革、创新，包括对微观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改革。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教授发言

我从开放这个问题开始讲，首先从开放得到角度来讨论一些有关财政的事情。关于改革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框架，而关于开放的问题有大家更多地还是停留在讨论的环节上。今天我想从开放 2.0 来说资本市场的开放，我认为开放 2.0 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开放。

首先，如果我们总结 1978 年到 2012 年，34 年经济高速发展有哪些基本经验，经济体制改革、自由贸易、政治稳定、以及相对独立的资本市场，由于我们有相对独立的、相对封闭的资本市场，才成功地避免了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

其次，开放新阶段有何特征，我认为第一世界变了，第二中国变了。世界变化的原因，即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头，一个是市场的扩张，第二个是人力资本积累，市场的扩张、全球化贸易使世界 GDP 纸币从 1960 年的低于 25% 增长到现在的高于 45%。如果对比世界和中国之间的区别，中国市场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由于中国及周边地区的 GDP 已经占世界 GDP 的重要份额，周边地区对中国的经济高度依赖。举例来看，我这里是几个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大陆的贸易依赖度都是排第一，蒙古 55%。下面如果去看在 1990 年和 2009 年的区别，1990 年北美在 27%，28%，欧美是 31%，现在欧美是 18%，19%，北美是 20% 左右。所以，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已经是三分天下了，这是我们的开放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所在。

中国开放的首要任务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开放，一个是对内消除国内各个地方之间贸易与要素流动障碍，尤其是行政障碍，形成统一的竞争、开放、高效的中国大市场。同时，对外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经济体系，市场的经济体系，推动世界经济新体系的建立。

以中国为中心的开放，最核心的是满足全球第一大市场、即中国市场的需求，也就是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和技术来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地去改革进口制度，充分地利用世界市场、世界技术，从而使中国老百姓可以买到全球性价比最好的产品。这就需要建立中国市场的技术规范，建立以中国企业主主导核心技术的制造业、服务业等现代产业。借鉴高铁行业的经验教训，建立以中

国技术主导的汽车产业。当然，与此同时，还需要建立以中国经济为背景的市场经济理论。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如何结合产业政策是一个首要任务。为完成这种结合，首先要引领全国进口体制的改革，打破地区市场分割，使中国老百姓能买到全球性价比最好的产品。其次要建立全球技术市场中心，建立中国市场技术规范。第三要重振上海制造业中心的雄风，推动中国核心企业群的出现，推动现代制造业的建设，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主导行业汽车制造业等的优化与迅速发展，根本改变中国市场无中国品牌的局面。第四要对外实现最优资本流动控制，建立人民币主导的东亚新兴市场金融体系，对内推动金融行业，投资体制的全面改革，实现统一而高效的中国资本市场。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教授发言

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孙元欣教授发言

各位下午好，非常感谢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来和各位专家做一些学术上的讨论。首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有两个主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和深圳的改革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深圳的改革当时是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中央有着非常清晰的顶层设计，并且有着很强的系统性和计划性，其总体设计可以参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里面包括 60 条 16 个方面，又可以分为 6 大门类，包括政治、文化、经济、国家安全、环境等五个方面。因此，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不能只以上海为中心，而更应该以国家战略为重点。

第二个概念是上海自贸区试验改革的意义，现在所说的“第二次入世”其实是指我国与国际新的投资贸易体系的入世，之前的“第一次入世”是指中国加入 WTO，主要是贸易体系的入世。通过负面清单的管理，使得中国和国际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渐渐接轨，而这种接轨是上一次的贸易结构更高层次的接轨，所以也叫做“第二次入世”。“第二次入世”可能比“第一次入世”的影响范围更广，因为第一次只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国际贸易，而第二次则涉及到了整个的投资体系，不仅包括外商的投资体系，还包括国内的投资体系以及相应的政府体制改革。

自贸区的改革是我们国家改革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基本思路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总体是为了构建一个开放性经济的新体制。在此之中，我研究的是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一年以来，上海自贸区不仅推出了 2014 版负面清单，同时也收到了外商企业的积极响应，正如韩正书记讲的“以负面清单为管理的改革是自贸区的重点也是亮点”。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下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内涵和外延方面都有拓展，内涵方面从外资准入管理，转变到现在加入一个政府全面负面清单管理，其作用对象和功能也有很大的区别，政府权力负面清单管理对全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其实更大。另外从国内国外对比来看，我们还以东道服务推出了一个负面清单。从负面清单管理现在只是一种规则的尝试，规则的尝试会推广到全国，如果规则能够对证实是可行、合理有效的，今后会在未来三五年会进一步推进，并把这些规则

固化下来，这样既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也可以让国家迈上一个新台阶。

在做负面清单的研究的同时，思路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 2015 版的设计问题上，而更要考虑到 2015 版以后的事情。同时，我们也梳理了中国现在作为东道国的负面清单和美国的负面清单的情况，两者可以从三个纬度进行比较，比较出来有 16 个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包括基础层面和技术层面，基础层面又包括 6 个重大问题，包含负面清单的措施、法制体系的契合程度、投资的口径等等。因此，如何推进这项制定负面清单的背后其实还存在很多的难点，也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个方面的研究里。谢谢大家！



上海财经大学孙元欣教授发言

媒体互动实录

【提问一】：我是《经济观察报》的记者，我第一个问题想请问权衡所长：刚刚您讲的一句话“上海自贸区又没有税收优惠为什么企业要过来？”，这让我想到很多，如果这句话反过来推那就是上海自贸区要吸引什么样的企业？应该像新加坡那样的政府完全保持竞争中立，还是在引入企业方面体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第二个问题我想请问孙元欣教授，您刚刚讲到正在研究中美负面清单，不仅仅停留在 2015 版的设计，还要有更长远的设计，您也讲到不能总是按照外国的经验用倒逼开放的节奏去制定清单，而应该为未来预留一个空间，那么这中间的尺度应该怎么把握？谢谢！

【权衡】：对于现在的上海自贸区，我理解的政府对自贸区的定位，是要求和企业对自贸区的需求不一样，希望把重点放在自贸区更多地体现制度创新、以及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上，如此一来上海自贸区就不再是政策优惠的洼地，而是制度创新的高地。但实际上，全球那么多的自贸区中有一条多多少少都涉及到税收优惠的政策，可能很多的企业都在观望这一政策。

【孙元欣】：BIT 的负面清单实际上与我们自贸区的准入清单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同时，BIT 负面清单要起到双向保护的作用，而现在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是对外资准入。中国的企业已经开始渐渐地走出去，在全球 500 强中间也有了许多席位，而在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如果不能得到投资保护协定的保护则会经常吃亏。所以，在 BIT 负面清单谈判的过程中，如何保护中国企业走出去和美国对等地开展投资保护协议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借鉴美国 BIT 范本对我们来说也会有一个倒逼的作用，比如说美国提出 BIT 里面的口径，里面包括投资企业、投资项目、金融的负面清单管理以及开放的问题。我国现在的负面清单只涉及到外商的投资企业和投资项目，有关金融领域还没有涉及，事实上我国现在的投资口径比 BIT 的口径要窄。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事情，一个是有学习和借鉴的作用，另外也要求发挥我们自身的作用。

【林毅夫】：我也补充说明一下，刚刚我们这位记者朋友问的问题，他有先暗含一个前提，就是香港、新加坡政府对市场没有干预。但事实上香港、新加坡政府是不是真的对市场没有进行干预？其实不是。比如香港发展的金融产业，鼓

励各个金融机构入驻，世界银行在香港设的 IFT 国际金融中心总部，房租就是由香港政府支付。而新加坡政府也是一样鼓励金融机构的入驻，所以房租也是免费的，另外新加坡不仅是在金融业，在制造业上也花了很多的精力。比如 60 年代 70 年代，新加坡发展电子加工业，然后在进入到石油化工产业的时候，新加坡就把石油化工产业的整个产业链切除，将其迁到一个地方、设立一个岛，然后一次性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相关石油企业一起招商引资进入。到了 80 年代 90 年代，新加坡大学开始大力支持生物学、医药学的研究，期间培养了大量的专业学生和研究人员。这就是新加坡成为亚洲地区唯一一个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的原因，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产业结构变更中不断地在发挥作用，所以简单地说香港和新加坡没有产业政策、政府不干预是不对的，这二者的成功其实都归功于政府非常有为的因势利导。

【提问二】：我是《上海东方教育时报》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来问林教授和蒋教授。第一个问题是林教授您在讲到新加坡随着经济产业的调整在人才培养方面有着一定的调整，那么您认为在这些年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在高校学科布局上面有那些好的例子能够支持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个问题是问蒋教授，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上海财经大学作为全国重要的财政院校，在人才结构的培养上以及在学科布局上是不是有一些意见性的调整和布局？谢谢！

【林毅夫】：教育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这个在现代经济学里头是共同接受的。但是我们发现有不少国家地区教育改善非常多，但是经济并发展不好，最主要是教育对实体经济不匹配。在发达国家，决定经济发展的最终标准是教育，对于发达国家是合理的，因为它的产业经济结构在最前沿。而发展中国家还在追赶过程中，首要的人力资本必须配套，但并不见得是越高越好。如果人力资本提高的同时产业结构不提高的话，可能人才只能到美国去就业，然后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那么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呢？我想这其中相对比较成功的例子是东亚经济，因为东亚经济在教育上面是投入不少的，但是其实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对实体经济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又比如说新加坡原本没有制药产业，但是它发现制药产业的附加值很高，它发现对于美国、德国、瑞士等高收入国家，制药产业的贡献非常重要。所以新加坡选择了制药产业，但当时的人力资本没有生物和制药专业的储备，所以新加坡政府从 90 年代开始就

大力地强化新加坡国立大学，并大大增加了生物方面的和制药方面的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培养了很大的人力资本群。所以，应该要了解实体经济的支撑点，同时超前地投资人力资本，二者结合起来。

【蒋传海】：刚刚媒体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好。实际上学校对这些方面是做了深入的思考。

第一个思考，即高等教育的定位，大学的功能现在讲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产品，但我们觉得中国的大学在反思并要回归到大学人才培养的本源，因此财大也在深入地思考如何回归到人才培养的本源，在这方面我们构建了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有财经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

第二个思考，在学科方面，学校也有很多的考虑。首先是关于学校学科布局的考量，即为培养财经特色和优质学科，因此学校在学科布局上构建了经、管、法、文、理作为支撑的多层次、多体系的人才培养的学科生态。其次，学校也考虑到社会的需求对学科进行了非常大的优化，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我们利用高校能够在一级学科下面设置二级学科的权限，设置了一些社会需求比较大的学科，同时对一些相对而言与社会需求比较脱节的学科我们对其进行优化。第三，我们进一步地鼓励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通过构建一系列的平台来培养复合型人才，学校也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停地去探索如何来优化学科结构布局，其中首要的就在于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提问三】：我是本校（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是研究网络经济的，我想请问中国应该有哪些关于网络经济产业的政策？

【林毅夫】：网络经济其实和资本帐户是一样的，资本帐户也有短期资本的流进流出，在可能碰到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的时候，如果有短期，政府可以马上加强管制，要想完全放开基本是不可能的。我之前所说的基础科研其实不是在国内做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外完成的，中国在目前的阶段对互联网的使用和发达国家对互联网的使用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实体交易的成本高，就为虚拟经济降低成本提供了机会。所以，我认为互联网经济的政策在运用的新的方式时，应该积极支持创新，而且积极支持不仅仅要放开，还应该为其创造条件。比如说互联网要放开新的产品、新的团队，政府地方应该在政策上有一定的扶持。包括阿里巴巴选择在杭州落户的原因，除了因为杭州风景漂亮的原因之外，还在于杭州地方政府

有很多相关的政策。因此我认为互联网政策如果像这样做一些调整的话，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会增加很多“弯道超车”的机会。

【提问四】：我想请问教林毅夫教授，我个人非常喜欢“新结构经济学”中提出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概念。在我看来，市场和政府可能都是推及至人的，我能理解市场有效率是通过有序的竞争有效率，有序的竞争是通过释放合理的价格信号，合理的价格信号可以引导人们稳定的预期。您之前说的“有为政府”应该因势利导，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元规则，元规则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供，并且在元规则具体实施的时候如何把公家利益和大众利益协调好。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大问题包含两个小问题。

【林毅夫】：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有效市场”的内涵相对是比较清楚的。那么“有为政府”的内涵是什么？我想这需要跟多的深入研究。“有效市场”从亚当斯密开始研究到现在已经研究了 270 年，而“有为政府”的研究还非常少，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也是正常的。有关“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因势利导的框架，在市场竞争的方式下和产业结构升级到技术创新，对于失灵的地方进行必要的协调、提供各方服务，那么这种政府干预就是有效的。在 80 年代 90 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如果提出一种理论说基础设施会促进经济增长，将会是有价值的，但到了 90 年代以后，我们认为如果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价值就都应该去实施。拉美三十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有一种结构，只做了无线通讯这一种基础设施，港口、高速公路、铁路等都无人问津。无线通讯不是垄断就是垄断竞争，相对而言投资回报率非常高，而其他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港口等无人问津的原因，其一是需要长期投资，并且其回报的多少取决于使用密度的高低，使用密度的高低取决于国家的发展态势，而民营企业是无法决定国家的发展态势的。其二是一次性资本投入过高、回收周期过长，其中还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增加了很大的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介入企业就会遇到很多瓶颈，而“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在这一点上提供一个框架去说明哪些方面按需要政府协调、哪些内容需要政府提供。试想如果我们抛开对“政府干预”的习惯性排斥，解放思想以探索，多思考针对特定的问题应该由市场来处理、还是应该由政府来协调，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想我们很快就能了解“有为政府”的含义，这样也就避免了政府做太多、或是作太少的错误发生。

媒体报道（部分）

1、新华社：《林毅夫：中国将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

新华网上海9月29日电（记者陈爱平）“中国的经济必将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29日举办的“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研讨会上表示。

林毅夫表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而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既需要“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形成竞争优势，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

林毅夫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正是为进一步界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边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通过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以及可复制可推广，助推中国能够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中国经济必将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

“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研讨会由上海财经大学主办，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联合承办。

2、上海证券报：《上海自贸区肩负四大产业重任，专家建言自贸区破题思路》

9月29日，上海自贸区“社会参与委员会”正式揭牌。自贸区选择在其周年生日将事中事后监管六项制度创新之一的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制度正式推出，在探索政府机构改革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同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论坛上，作为上海自贸区建设总体方案设计者之一的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呼吁，自贸区需要下定决心，力争在开放倒逼改革上破题。

负面清单等制度建设还需破题

上海自贸区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压力测试平台。在王新奎看来，以开放促改革，这还是一个完全没有破题的领域。“我们已经下定决心，

一周年结束以后要破题了，怎么倒逼，从什么地方入手，不能总是讲。”

如何破题？中央的顶层设计给了思路：自贸区是国家的试验田，不是地方的自留地。自贸区的关键是成为制度创新的高地，决不能成为优惠政策的洼地。

具体到细节，最新召开的上海自贸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给出了脉络。记者获悉，该会研究部署了自贸区下一步工作，围绕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创新和事中事后监管四大领域重点改革任务的突破，加强税制和法制两大保障支撑，与会者进行了探讨。

在该会上，上海市市长杨雄要求，上海市相关部门要主动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的沟通汇报，争取更多的改革创新举措尽快在自贸区平台启动试验，取得实效。要切实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把企业意见和建议作为评价自贸区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标，提升服务企业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继续自我加压，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毫无疑问，自贸区的制度建设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王新奎直言，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的改革是重要突破口，下一步应进一步加强负面清单管理的透明度，包括可获得性、可预见性、稳定性，确实做到不公布不执行。以此为先导，不断扩大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进一步开放。

“我们正在做负面清单的研究，现在思路已经不是 2015 版的设计问题，而是要考虑到 2015 版以后的事情，以及更广阔的事情。”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副院长孙元欣则在上述论坛中如是表示。

另一方面，自贸区还需要重新思考过去特殊监管区域做法。王新奎表示，自贸区的建设是旨在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别于过去的监管区，自贸区并不搞特殊政策优惠和支持，这就必然要求从制度创新上进行创新，通过创新换取市场的活力。

自贸区还需在产业发展上寻求突破

以开放倒逼改革，要求自贸区在产业发展政策也需寻求突破。专家们认为，中国开放的两个首要任务是：对内消除国内各个地方之间贸易与要素流动障碍，尤其是行政障碍，形成统一、竞争、开放、高效的中国大市场；对外则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经济体系，推动世界经济新体系的建立。

在此背景下，上海自贸区和国家产业政策怎么结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

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给出了建议，他认为上海自贸区承担四大重要任务：第一引领进口体制改革，打破地区市场分割，使中国老百姓能买到全球性价比最高的产品；第二建立全球技术市场中心，建立中国市场技术规范；第三，上海从来就是制造业的重镇，自贸区需要重振上海制造业中心的雄风，推动中国核心企业群的出现，推动现代制造业的建设，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主导行业汽车制造业等的优化与迅速的发展，根本改变中国市场无中国品牌的局面；第四，对外实现最优资本流动控制，建立人民币主导的东亚新兴市场金融体系，对内推动金融行业、投资体制的全面改革，实现统一而高效的中国资本市场。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昨日则开创性地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结构主义的“新结构经济学”，建议各地按自己的现有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他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

其实，自贸区挂牌以来，一直在积极调整产业规划和形态规划，原来以贸易、物流和加工制造为主导产业的格局，正逐渐转变为以国际贸易、金融服务、航运服务、专业服务以及高端制造五大产业为导向。

“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为进一步界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边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通过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必将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林毅夫指出。

3、其他媒体报道（按发布顺序排列）：

1) 腾讯财经，9月29日，“自贸区建设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论坛专题；

<http://finance.qq.com/zt2013/shzmq/zimaoqu.htm>

2) 新华08网，9月29日，官员：自贸区开放倒逼改革任重而道远；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40929/1534204>

3) 凤凰财经，9月30日，上海自贸区肩负四大产业重任 专家建言破题思路；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930/13159036_0.shtml

4) 21世纪经济报道，9月30日，上海自贸区周年：最大亮点是负面清单；

<http://news.163.com/14/0930/01/A7BR8MPA00014SEH.html>

5) 新浪财经, 9月30日, 官员: 自贸区开放倒逼改革任重而道远;

http://fund.ebank.spdb.com.cn/stock/Company_InfoContent.aspx

6) 搜狐教育, 9月30日, 上海财大EMBA 聚焦上海自贸区改革一周年;

http://edu.ifeng.com/a/20140930/40827981_0.shtml

7) 中国证券网, 9月30日, 上海自贸区肩负四大产业重任;

<http://business.sohu.com/20140930/n404784046.shtml>

8) 网易财经, 9月30日, 王新奎: 开放倒逼改革仍待破题 上海自贸区任重道远;

<http://money.163.com/14/0930/14/A7D8FKGM00253B0H.html>

9) fx168 财经网, 9月30日, 王新奎: 开放倒逼改革仍待破题 上海自贸区任重道远;

<http://www.fx168.com/forex/rmb/1409/1287215.shtml>

10) 中国财经时报网, 10月4日, 林毅夫演讲实录,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http://www.3news.cn/html/2014/guonei_1004/6570.html

11) 一财网, 10月5日, 王新奎: 自贸区以开放促改革尚未破题;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930/13160229_0.shtml

12) 新华网, 10月5日, “中高速”的“新常态”下 中国经济如何实现“高收入” ? ;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0/05/c_1112716991.htm

13) 求是理论网, 10月10日, 着力培育有竞争前景的产业;

http://www.qstheory.cn/freely/2014-10/10/c_1112767635.htm

14) 经济观察报, 10月11日, 上海市委书记: 自贸区是国家试验田 不是地方自留地;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011/13175749_0.shtml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 10月11日, 学者研讨上海自贸区建设经验 提建全球技术中心愿景;

http://www.cssn.cn/zx/bwyc/201410/t20141011_1357692.shtml

16) 中国教育新闻网, 10月11日, 上海财大举行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论坛;

http://www.jyb.cn/high/gdjyxw/201410/t20141011_600773.html

17) 上海热线, 10月13日, 上海自贸区一周年 专家齐聚财大共话改革探索;

http://www.shnbsh.com/detailed_fw.asp?id=535099

18) 新民晚报, 10月17日, 营造一个国际化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

<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41017/2733506.shtml>

19) 国际金融报, 10月20日, 产业升级可避中等收入陷阱;

http://www.qstheory.cn/zhuanqu/bkcx/2014-10/20/c_1112898833.htm

20) 东方教育时报, 10月15日, 探寻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去向——上海财大“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论坛: 国内产业经济瓶颈亟待破解

2014年10月1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袁征
E-mail: yuanzheng@shcedunews.net

看社会 SOCIAL 9

探寻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去向

上海财大“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论坛: 国内产业经济瓶颈亟待破解



自贸区正在给普通百姓带来实惠。CFP/图

时报记者 袁翔

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经济已走过35年的高速增长期。在新一轮的经济转型中,中国产业的发展重心在哪里?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能否为经济转型提供先行先试的样本?

在中国(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周年之际,上海财经大学举办了一场“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高峰论坛,邀请首席执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袁新、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于春晖等国内知名专家,一起探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动向。

产业政策助推35年经济发展

从1978年至2013年,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8%的增速在发展,人均收入达到6800美元,从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成功避免了多次全球金融危机。

针对这轮经济奇迹,多年致力于回答经济学的“卢卡斯之问”(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密和机制到底是什么?)的世行副行长林毅夫认为,“正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和‘世界工厂’的地位。”

拓展阅读

与产业结构匹配 教育要有大眼光

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人才培养和教育将带来哪些挑战?高等教育是否有必要针对未来的社会需求,进行预见性的学科调整和布局?对此,林毅夫认为,教育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解决教育发展与实际经济不协调的问题,使人力资源与产业结构相匹配。

林毅夫解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中国各级政府则动员其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完善基础设施,引进外资以克服社会资本短缺和其他无形约束,降低了各个地区所要发展的主导产业的成本,可以很迅速地在当地在要素价格上面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是必要的。林毅夫说,“虽然从标准的理论来看那些政策有问题,但是在扭曲的环境下它是有效的。正是在绝大多数正确的产业政策推动下,中国经济才有了过去35年稳定快速的发展。”

产业经济瓶颈如何破解

当然,前35年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经济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

南京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理事刘世超教授总结中国过去产业政策的4个特点:一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挑选赢家和赢家政策,是一个优生的政策而不是优育的政策;二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典型的西方学者讲的产业政策是不一样的,它并非完全中央化指导的政策;三是中国的产业政策不是以完全创

造市场环境、公平竞争为主的政策,而是以结构调整为核心的政策;四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是非横向的政策,而是纵向的政策。

如何克服这些难题,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于春晖表示,一个国家的成功转型,从低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有赖于这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

随着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家的部分产业向国外转移是一种趋势。林毅夫举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很多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成衣、纺织业、电子业都转移到了日本;上世纪60年代日本发展起来以后,这些产业又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上世纪80年代,这些产业又转移到中国。“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必然也会对中国产业升级的结构变迁。”

林毅夫表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培育未来具有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上海的造船业已接近世界最前,如果还想保留造船业的竞争优势,就一定要在新技术上面有所开发。

上海自贸区可提供哪些样本

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先行

先试者,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从2013年9月29日挂牌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已推出了多项改革举措。

与会的多名专家认为,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林毅夫表示,一个国家的成功转型,从低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有赖于这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

随着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家的部分产业向国外转移是一种趋势。林毅夫举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很多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成衣、纺织业、电子业都转移到了日本;上世纪60年代日本发展起来以后,这些产业又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上世纪80年代,这些产业又转移到中国。“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必然也会对中国产业升级的结构变迁。”

林毅夫表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培育未来具有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上海的造船业已接近世界最前,如果还想保留造船业的竞争优势,就一定要在新技术上面有所开发。

上海自贸区可提供哪些样本

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先行

重要速递 Important News

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录即将展开

2015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即将开始,今年计划招录2.2万余人。考试报名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至24日,公共科目笔试时间确定为2014年11月30日。据介绍,今年国家公务员招录将继续坚持向基层的政策导向,降低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进入门槛,其中重点招录大学生村官。

教育部要求开展教育系统扶贫日活动

2014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一个扶贫日。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集中开展2014年教育系统扶贫日活动,中小学以扶贫教育为主,增强学生的扶贫意识;职业院校和高等学校将扶贫教育和扶贫实践活动相结合。在师生中开展扶贫教育,扶贫帮困、志愿服务和捐款捐物等活动。活动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对学生的国情教育,激励学生关注贫困地区、关爱贫困群众,支持扶贫工作。

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在沪研修

10月11日,2014年第四期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高级研修班在华东师范大学开班,来自美国、英国、瑞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25个国家的39位外方院长齐聚华东师范大学,研修中国文化、探讨孔子学院的未来发展。本次研修课程内容包括中国民俗学、外交、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医等多个方面。研修班还将通过组织专题研讨、与官员官员座谈、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加强院长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孔子学院发展规划的了解。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高校巡展移师建桥学院

10月10日,“民族脊梁、学界楷模——人民科学家钱学森”2014年上海高校巡展在上海建桥学院站开幕,这也是该项展览首次由民办高校承办。展览以纪录片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回顾了我国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的科学态度、求真务实的学术作风和诲人不倦的师风风范,生动诠释了钱学森身上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
CHIN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777号
邮编：200433
电话：021-65906859
传真：021-65907458
电邮：cidi@mail.shufe.edu.cn
网站：cidi.shufe.edu.cn
微信公众平台：上财经智库



网站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